

易經新論

周山著



易經新論

周山著

易經新論

易經新論

易经新论

周山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新登字6号

易经新论

周山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163,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 3/4 插页: 4

印数: 精装: 15,345—16,344

 平装: 32,421—35,120

1993年3月第1版 1993年10月第3次印刷

责任编辑: 俞晓群 刘瑞武 责任校对: 陈文本

封面设计: 沈放

ISBN 7-5382-1233-7/C·67

精装定价: 6.10元 平装定价: 4.50元

前 言

皓首，未必便能穷经。中国有多少名儒隐士，几千年一以贯之，苦苦追求《易经》之奥秘，结果“玄之又玄”，越释越玄。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仅拿到《易经》图，便发现了它的二进制数理。他欣喜若狂，自认为具备了加入中国籍的资格。莱布尼茨捡了一个大便宜？不。他有建立二进制数学体系的功底，这是在他之前所有中国学者和外国学者所不能企及的。

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的文化价值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军事、经济，又有哲学、文学等等；但是，作为人类最早的一个符号推演系统和概念系统，它规范了中国文化的思维定势，作为推理工具的文化价值无疑居于首位。

为了便于读者对《易经》本质的了解，正确评估《易经》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尝试着写了这本书。但是，本书并不是单纯的介绍。对于《易经》的形成时代，它的性质，自不敢囿于旧见。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工作者，我特别注意对《易经》的体系特点、推理规则，以及对传统思维模式的规范影响，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可能并不成熟，但是自觉距离真实不远。

关于《易经》卦爻辞的译注，汗牛充栋，实在收不胜收。近年来关于卦爻辞的译释也层出不穷，但是连译带注，每本译著都很丰厚，可资专业理论工作者参考，却难以一般爱好者卒读。本书末尾所附易经卦爻辞今译一篇，聊资初涉《易经》的

同志入门参考。在今译时，（一）略去了繁琐的文字训诂，只提供本人的思考结论；（二）力求卦辞与该卦六个爻辞之间的连贯性，以求一卦整体性；（三）注重意译，努力揭示譬例背后的人事论。总之，力求既言简意赅又不违古经原意，谅不致有误人之嫌。

本书历两月草成，疏误之处，请读者诸君赐正。

作者

1988年12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目 录

前 言	1
绪论：不易之《易》	1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篇章	2
二、不易之《易》	8
第一章 类物之情	
——对象语言：卦爻符号之谜	13
一、初始符号的产生背景	14
二、经卦——八卦的谜底	15
三、别卦——六十四卦	21
第二章 见仁见智	
——自然语言：卦爻辞的文化价值	31
一、卦爻辞的政治历史价值	32
二、卦爻辞的哲学价值	39
三、卦爻辞的文学价值	46
第三章 玄之又玄	
——推理规则	52
一、自然递进律	52
二、当位律	54
三、对应律	56
四、三段律	57
五、二段律	59

六、整体律	63
七、变爻律	65
第四章 阴阳相抱	
——体系特点	69
一、辩证性	69
二、形象性	74
三、推理形式转换的灵活性	77
第五章 兆数诡异	
——占事方法	82
一、成卦方法	82
二、据象推论	86
三、据辞推论	89
四、象、辞结合推论	92
五、结论准确性与“占工”技巧性	95
第六章 韦编三绝	
——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101
一、对中国哲学发展的影响	102
二、对自然科学的影响	110
三、从决疑解难到骗人钱财	116
结语：飞龙在天	119
附：《易经》今译	124

绪论：不易之《易》

一部书，可以使一个作者名垂千古，如《论衡》之王充，《神灭论》之范缜等。一部书，也可以使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光照日月。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中，《易经》便是一颗使整个华夏民族为之生辉的瑰宝。

它是华夏文化的源头，也是人类文化史上最璀璨夺目的第一华章。

宋代著名学者朱熹有诗云：“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华夏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华夏先人对自然万物的认识的深化，无疑是《易经》的源头活水。《易经》的问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有象华夏民族这样历史悠久的民族，才可能这么早地产生出《易经》这部煌煌巨著、不易之作。

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即距今六千年前，我们的先人便已率先进入了以龙为图腾主体的父系氏族社会，已经能够制作精美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例如，一九八五年在河南北部的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发现，不仅有大批制作精细的石、骨质生产工具和陶质鼎、环罐、瓶、碗等生活用品，有腾云驾雾的贝塑神龙和张牙舞爪的贝塑猛虎，甚至还有后世史书所传“黄帝乘龙”的神话场面的蚌壳摆塑图。不仅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形象思维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逐渐形成，而且从自然界

的启示中渐渐朴素地感觉到了客观世界发展变化的辩证规律。从结绳记事，到象形文字的产生，人们的思维活动内容越来越深化，思维形式也越来越复杂。为了使人际间的思想交流规范化，具有约定俗成的权威性和增加推理活动的准确性，人们从千万次的思维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了一些思维的基本方法和推演规则。这些雏形的断断续续的经验总结，又经过千锤百炼，终于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抽象的符号推演系统，这就是《易经》。

《易经》以其完整的符号系统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帮助炎黄子孙开展理性的思辨活动；炎黄子孙的理论思维水平，也便在围绕着《易经》的不断研究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说：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经起到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而每一项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几乎都离不开《易经》思维模式的启迪帮助。

一、中国文化的第一篇章

《易经》又称《周易》。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认定，《易经》作者是商末周族领袖姬昌（商纣时为西伯），即后来灭商建立周朝的周文王。《史记》言道：“西伯……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也有人认为，易经六十四卦的作者是伏羲而不是周文王，例如《淮南子》说：“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祸福矣。伏羲为之六十四变。”但是，纵观整个汉代易学研究，基本上却都附和司马迁之说，例如扬雄说：“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法言·问神篇》）。东汉王充也言道：“《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论

衡·对作篇》)

这是汉代人关于《易经》著作年代的说法。事实上，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资料，还可上推至战国时期，即对《易经》展开第一次系统研究、写作《易传》（即《十翼》）的那个时代。《系辞传》明确言道：“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所谓包牺氏者，就是伏羲。八卦为伏羲所创，自无可疑。从八卦进入六十四卦，亦即一个完整的符号组由三个爻进步为六个爻，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一飞跃究竟继伏羲之后由谁完成，《易传》作者已经难以确切地把握了，因而在《系辞传》中只作了大致的推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传》作者将《易经》的著作时间，大致确定在商末周初这一所谓的“中古”时期。

不管怎样，据于这些最早的文字说明，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易经》为商末周初亦即公元前十一世纪的一部作品了。

但是，近人郭沫若却认为《易经》的创作年代“决不能在春秋中叶以前”，“即孔子亦未及见”；经过再三再四的考证，他认定《易经》的作者乃是孔子的再传弟子豢臂子弓（详《青铜时代·周易之制作年代》）。另一些学者如顾颉刚等，也将《易经》的制作年限下移至战国时期。这些学者，凭什么将《易经》的制作年限大幅度地下移呢？

原来，他们是从八卦的卦画与春秋以后的既成文字字形之间的关系，以及《易经》中的部分卦爻辞内容与春秋故事相一致上加以论证的。

郭沫若认为，八卦的卦形大部分是由春秋以来的一些既成文字诱导出来的东西。例如：

“坎所象徵的是水，水字的古文作，坎卦的卦形，分明是由这字拉直而横置起来所成的。”

“乾卦所象徵的是天是金是玉，金和玉的两个字里面都包有的卦形。就是天字也是包含着的。天，古字作，把当中的一笔竖画去掉，稍稍加以修正，便可以成为的卦形。”

类似这样的分析很多，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分析文字，是否就可以作为论证八卦符号创始于春秋以后这一观点呢？是否就可以理由充足地推翻战国时期的《系辞传》作者关于伏羲始作八卦的历史性记述呢？不。

在上述考证中，郭沫若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这就是他仅仅根据《系辞传》作者说的“观鸟兽之文”一句话，便将卦画与春秋以后的一些文字之间孰先孰后的次序作了颠倒。他先假设了八卦符号由既成文字诱导而来这一前提，然后按此从既成文字构造中寻觅卦形；按照他的这一论证方法，我们同样可以先假设春秋以来的一些象形文字实由八卦卦形诱导而来这一前提，然后由八卦卦形及其所象徵对象寻觅出相应的象形文字。

八卦卦形与相应的象形文字孰先孰后的问题，决不能简单片面地理解并解释《系辞传》作者的一句话。在没有直接根据的情况下，我们与其相信近人如郭沫若等人的假说，还不如相信古代人关于这一问题的最早最原始的记述。距《易经》最近的记述，是左丘明的《左传》：“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而稍后的《系辞传》，则对于八卦的起源，有更加明确的说法，这就是前文已作引述的“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一段文字。在创制八卦的过程中，伏羲主要取象于天、取法于地；虽然其中也有“观鸟兽之文”的工作，但这些象形文字显然是上古时代的而非“春秋以来”的文字。

总而言之，作为《易经》前身的八卦符号组，决不是从春秋以来的文字中诱发出来的东西。恰恰相反，春秋以来的一些文字，得益于八卦符号组的启发。

郭沫若关于《易经》创于孔子再传弟子子骅臂子弓的论证，源于他把一些假说性的观念作为证据，同时又将《易经》的卦象与卦爻辞视为不可分割的一体，认为易经六十四卦卦体与卦爻辞乃出于一人所作的缘故。这样，也便将部分爻辞的内容与《左传》所记春秋中叶故事相同作为根据，推论包括卦体在内的整个《易经》均为“孔子以后，即战国初年的东西”。

事实上，借助于《左传》所记载的有关史料，只能说明《易经》系辞写成于春秋之前。因为同样在《左传》中，有许多记载春秋早期人即已广泛地运用《易经》进行占卦问吉凶的事迹。例如，《左传·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71年）记述道：“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在这一占卦活动中，周史所引用的“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一句，正是《易经》中的《观》卦的六四爻辞。因为六四爻在占卦时为老阴数，变而为阳爻，逐成之卦《否》；根据《易经》推演规则，这一卦当按本卦中的变爻辞，即《观》之六四爻辞进行推论，故周史有此“观国之光”一说。

又例如，《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记述道：鲁桓公的小儿子将要生的时候，卜楚丘之父用《易经》占了一卦，遇到《大有》䷍，因为第五爻为老阴，故变为阳爻，《大有》卦变成了《乾》卦䷀，象征父子同德。

这样的例子，不仅在《左传》中有大量记载，另一古史书《国语》中也多有记载。这里不一一赘述。这些史料能够充分地说明，《易经》一书，早在春秋以前即已著成。

在《易经》爻辞中，果真有一些内容是春秋中期的有关人

物事迹吗？郭沫若的最有力证据，是关于“中行”的爻辞：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
（《泰·九三》）。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苞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郭沫若认为，《易经》中多次出现的“中行”，“就是春秋时的晋的荀林父”，因为“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周易之制作时代》）。

事实上，《易经》中关于“中行”即荀林父的说法，只是一种无端猜测。曾经因为对《十翼》中的《象传》的著作时间作过详细考订而其结论为郭沫若“全表同意”的李镜池先生，就把《易经》中的“中行”作“途中”解释。

此外，郭沫若还从《易经》的文字色彩上，进行了一番引经据典的考察分析，认定《易经》中的诸多观念，具有浓厚的“南方色彩”，是楚辞、庄子时期的“南方系统的东西”。下面这一段文字，便是他的最为有力的论证：

例如最初的乾卦的关于龙的概念，特别是九五爻的“飞龙在天”的那种着想，依然是南方系统的东西。乘龙御天的那种浪漫的空想，除掉楚辞与庄子之外，在北方系统的著述中是没有看见过的”（《周易之制作时代》）。

如果说胡适先生的治学方法是“大胆假说，小心求证”，那么，郭沫若先生的治学方法则是“大胆假说，浪漫求证”。他在

作了上述比较性假说之后，便对《易经》的形成作了这样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判断：

周易的爻辞里面，如上文所述有利用春秋中叶的晋事的痕迹，在着想上又多带着南方的色彩，且与南方色彩更加浓厚的易繇阴阳卦复同出于魏襄王墓，关于这两种易的生成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明确的判断。便是易繇阴阳卦当是南方的人著的，而周易则可以有两种的推想。第一种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出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第二种是北方的魏晋人模仿着易繇阴阳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这两种的推想，由向来所有的易学传授的系统看来，是以第一种为近乎事实的。（同上）

遗憾的是，这一番因为龙的问题所展开的浪漫性推论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在近年的考古发掘中，我们已经看到，早在六千年前，即周文王囚羑里的三千年前，我们的先人，而且恰好是居住在距离三千年后周文王被囚之所不足一百公里的濮阳西水坡的先人，已经在部落首领的墓穴里用蚌壳摆塑出了神态各异、状如奔腾于云雾波涛之中的群龙，以及人骑在龙项上的神话画面，十分清楚地说明了郭沫若所谓的只有战国时期南方人才有的“乘龙御天的那种浪漫的空想”，是一个不符史实的错误断语。从西水坡出土的这些比目前已出土的上古时代其它地区的任何龙图腾形象更早而且成熟得多的蚌壳摆塑的人骑龙项等神话画面，使我们更有理由肯定在此三千年之后的商末周初，生长在河南北部的周文王之类的杰出人物，完全有能力构思创著出《易经》这部不朽之作。

人类最早的著作，或许不是《易经》。因为《周礼·大

卜》记载：“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传说，《连山》是夏朝的经典，以《艮》卦为六十四卦之首，因为艮象征山，故称《连山》；《归藏》是殷朝的经典，以《坤》卦为六十四卦之首，坤象征地，万物由地生养，又无不归于其中，故称《归藏》。然而，这只是一种传说，当时是否确有其书，也很难说；即有其书，究竟是夏、殷时代的作品还是《周易》同时代的同类作品，都不一定。就目前所能看到的著作而言，《易经》无疑是中国文化史上最早的一部著作。

二、不易之《易》

《易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这是长期以来一直争议的问题。

普遍的看法，认为《易经》是一部用作占筮的迷信之书，其内容是周朝人占筮记录的系统化；《易经》产生之后，人们便依据其中的卦象和卦爻辞推断人事吉凶。只是因为后来人们对它的解释越来越偏于哲理，所以渐渐演变为一部哲学书。

另一种意见正与之相反，认为《易经》是一个用符号文字表述的古代科学思想体系；它之所以被人误认为卜筮之书，是因为后来被数术家利用其符号体系作为卜筮的工具。

此外，还有种种说法。例如，有人在认定《易经》是周朝末期著作的基础上，根据《周易》这一书名，进行说文解字，认为《易经》之所以又名《周易》，是取周室即将变易的意思；这是《易经》作者为了挽救周室的危亡，根据旧筮辞编著而成的一本以占筮书为其形式的政论书，书中包含著作者的政见和哲学思想。也有人认为，《易经》是一部作者奉使、恋爱、被囚和求救的自叙传，由于作者身处忧患之中，所以只得

“假托筮书，隐约其辞，迷乱其迹，重重魔障，迷误后人”（徐世大：《周易阐微》）。《易经》如此，其《象》、《彖》、《序卦》等篇，也都是《易经》作者一手炮制而成，“其中皆含隐语”。（同上）

于是，关于《易经》的传说，也便越来越神乎其神；而对于《易经》内容的解释，更是五花八门，使人有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的感觉。

随着《易经》研究的深入，人们越来越感到《易经》中蕴含着许多科学真理，犹如一部百科全书，“含有哲理、数理、医理、物理（包括天文、宇宙来源）、生理……”（沈宜甲：《科学无玄的周易》）。

近年来，终于有人从方法论的角度，开始对《易经》的性质作出新的评价，认为它是从古天文学中发现的和逐步形成的一套认识、分析、计算、处理问题的方法，或为科学研究提供信息和揭示信息的来龙去脉及其因果关系；认为《周易》的理论结构有为科学资用的方法、原则、范畴框架、符号系统。从事中医学理论研究的邹学熹先生根据对中医学理论的研究心得，更是明确地认为：《易经》“是一门独特的科学，根本没有任何迷信的地方”；《易经》中所谓的吉凶祸福，“乃根据天人之间、事物之间的信息，所作出的客观推断，决非星相之学。”（《易学十讲》）

长期以来，人们借助于《易经》的思维方法，进行理性的思维活动，可是，他们却并不识“庐山真面目”，对它的性质作了种种并不符合其本来面目的分析，不免令人可惜。事实上，《易经》是一部帮助人们进行理性思维活动的工具书，是一部关于推理的书。如果说，西方人因为有一部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而引以自豪，那么，中国人就更应该因为有一部《易经》而引以自豪。

《易经》分为符号系统与卦爻辞两大部分。符号系统即由六个爻画组成的六十四个符号组；这些符号组又称卦体。六十四个卦体之间有一定的序列。战国时的学者曾撰有《序卦传》一篇文章，对卦体之间的序列问题作了详细解说。六十四个具有固定形式的符号组，乃是人们进行推演时的形式结构，约略相当于西方现代逻辑中那些“ $p \wedge q$ ”、“ $p \vee q$ ”、“ $p \rightarrow q$ ”一类的抽象形式，构成这一符号推理系统的那些基本符号和符号组，如“—”、“——”、“≡”、“≡≡”、“≡≡”、“≡≡”等，便是这一推理系统的对象语言；“阳爻”、“阴爻”、“乾”、“坤”、“震”、“巽”、“经卦”、“别卦”、“初九”、“初六”、“上六”、“用九”等用来解释卦爻符号的名称、位置、关系的文字，便是这一推理系统的语法语言。

卦爻辞是对卦、爻符号详加解释的自然语言。这种对卦爻符号作出某种解释的自然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推理活动中积累下来的一些典型事例，每一条卦辞或爻辞，都只涉及到相应的某类具体事物情况，在《易经》中只起着“举他物而以明之”（《墨经·小取》）的作用，所以，这些卦爻辞不仅对相应的卦爻符号进行了具体生动的解释，而且对于人们根据卦爻符号进行的推演活动，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卦爻符号组与卦爻辞之间的关系，正同今天的逻辑教科书中“所有 M 都是 P，S 是 M，故 S 是 P”与“所有金属都能导电，铁是金属，故铁能导电”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一个抽象的“空架子”，即“公式”，后者是对前者的一种具体说明。

卦爻符号与卦爻辞之间的这种关系，事实上古人也有发现者。例如唐代奉旨疏解《易经》的孔颖达，就曾经这样言道：“物有万象，人有万事，若执一事，不可包万物之象，若限局一象，不可总万有之事。故名有隐显，辞有踳驳，不可一例求之，不可一类取之。”（《周易正义》）《易经》的卦爻符号，是